

#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 户籍分层\*

李 骏 顾燕峰

提要: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分层的已有研究存在两个欠缺:一是只关注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二是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本文通过对比考察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围绕户籍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分割性的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就业结果这一核心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系统化的经验分析。基于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对个体的就业结果各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还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户籍分层过程。

关键词:户籍 分层 分割 国有 垄断

户籍制度一直深刻地形塑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差别经常被总结为中国社会最为根本的不平等结构;而且,这种差别同时具有地理和制度上的双重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人口流动的行政控制逐渐放松,但户籍制度却一直未有质的改变,于是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象。因此,法理上和事实上的城市人口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同一性。这一事实也对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户籍分层研究带来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即是,为论证户籍身份在中国的城市实有人口中构成了社会分层的一个新维度,研究者必须同时考虑个体户籍属性的双重划分——户口类别与户

---

\* 本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优配项目“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动力学”的资助(项目编号:644208)。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张乐天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的建议和帮助,并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初稿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校际研究生学术工作坊(2009年秋季)中宣读,过,组织者陈硕等与会同仁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口所在地,因为这种双重划分正是户籍制度的特性所在。

然而,以往的研究只关注了城镇居民(或非农户口人群)与农村移民(或农业户口人群)之间的对比,而忽略了户口所在地这一维度。鉴于地方政府有权出台各自与户籍有关的政策规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避免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也会像拥有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一样成为个体分层地位的一个重要决定机制**。然而,有关户籍身份如何影响城市实有人口的社会分层这一研究议题,经验分析并未完全展开。已有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人们往往只满足于论述所谓的“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而未在分析经济体系的分割本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检验按户籍身份区分的社会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这些不足都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户籍制度决定中国城市社会中不同个体机会结构的全部过程和机制。

为弥补上述研究缺憾,本文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两种不同的户籍属性——户口类别(因而形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与户口所在地(因而形成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的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个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其二,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是否以及如何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分割结构发生互动?我们运用一个新的研究设计,即同时比较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外地农村移民与外地城镇移民这4个户籍群体,来做更加系统的经验分析,以对上述研究问题给出较为完整的答案;并且,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同时引入所有制分割和行业分割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和测量,以观察哪一种分割形态更能捕捉户籍分层的作用逻辑。基于来自一个代表性城市的大样本数据(2005年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本研究发现,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和户口所在地——对个体的就业结果各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出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还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捕捉和反映出生动的户籍分层过程。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户籍分层的由来及其在改革进程中的演变,接下来批判性地回顾了相关文献并发展出了新的研究设计。之后,我们详细描述了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与变量,并深入分析了经验研究的结果。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了一些讨论。

## 一、户籍分层及其演变

19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新的户籍制度,并以此作为相互配套的几项基础制度之一来加强对国内人口流动的行政控制(陆益龙 2003)。在这一制度下,所有的家庭户都必须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登记,并被划分为农业户或非农户这两种类型。结果,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户籍身份就被这样一种具有双重划分特性的户籍制度所决定,即户口所在地与户口类别(Chan & Zhang, 1999)。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人口流动和户口转变都同时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国社会法理上和事实上的城市人口几近相等。因此,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经常就被归纳为城乡差别(例如,Cheng & Selden, 1994),而这一差别同时具有地理上和制度上的双重含义,即同时反映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以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

户籍制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管理手段,它更将本来平等的中国公民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按户籍身份的差异不平等地占有社会资源,而城乡户口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尤其明显。只有城镇居民才有权享受社会主义体制所承诺和提供的全部社会福利,包括国家保障的就业机会以及通过工作单位提供的补贴福利,例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等。相反,农村居民则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来实现地方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如此,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优先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政策将农业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输入和转移(例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城乡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户籍制度已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经验研究已经发现的那样,具有农村户口身份的个体其生活机会受到了结构性的限制(Wu & Treiman 2004)。

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逐渐放松了对人口在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行政控制。政府开始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非农工作,迅速成长起来的市场部门(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对廉价劳动力也有着大量的需求。步入改革进程以来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然而,户籍制度本身却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户口转变(或者是转变户口类型,或者是转变户口所在地,或者是两者兼有)仍然并非迁移的一个自然结果,尽管从1980年代

起户籍政策也开始出现一些调整和改革(Chan & Zhang, 1999)。持续增长的非正式迁移(即改变居住地但不改变户籍)导致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现象(目前总量已超过一亿人,相关数字可参见Liang & Ma, 2004;莫荣等,2005),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但却普遍缺乏与工作地城镇居民同样的正当居民权益(Solinger, 1999)。结果,基于城乡户口划分的二元体制在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将这一隐形的身份界线从农村与城市之间进一步延伸到了城市内部(Chan, 1994)。正如陈金永(Chan, 1994:135)所说,“中国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在结构上生成了一大批‘二等’城市公民,他们不享有正式的、永久的城镇居民身份。”

为了定量研究不同的户籍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经常观察的是职业获得与收入),许多研究者都关注于农村移民(或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比较。一项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一个1%样本,有关研究发现,农村移民倾向于填充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那些工作职位,例如体力型的、低技术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的职业类型,即使是控制了他们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情况也是如此(Yang & Guo, 1996)。这与许多重复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一致,即,两个群体在行业和职业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差异(Wang et al., 2002; Yang, 2003)。孟昕和张俊森(Meng & Zhang, 2001)进一步发现,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不仅存在显著的职业隔离,而且还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中的不可解释部分更多地来自于职业内部而非职业之间。与使用特定城市和特定地区样本的早期描述性分析一致(Knight et al., 1999; Wang et al., 2002),德姆希尔等人(Démurger et al., 2009)最近依据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再一次证实,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在年龄、工作经验和教育水平上都要低许多,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差异(他们称之为“非市场性的禀赋[pre-market endowments]”),而非所谓的职业隔离和工资歧视(他们称之为“市场性的歧视[on-market discrimination]”)。

由于户籍制度下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个体可以通过政策规定的途径(例如招工、升学、参军等)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即通常所说的“农转非”)其他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需要先将城镇居民按是否有“农转非”经历分解为2个亚群体,再将他们分别与(非正式的)农村移民进行比较。例如,范芝芬(Fan, 2001, 2002)基于广州市的一项抽样调

查数据发现,虽然非正式的农村移民确实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正式的农村移民(即有“农转非”经历的城镇居民)却比(没有经历“农转非”的)城镇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更具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更为成功。这与另一项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观察到的情形相一致,即,城市中两种类型的农村移民——保持农村户口与转为城镇户口——无论是在教育水平还是在职业获得上都显示出了本质性的区别(Chan et al., 1999)。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获得城市户籍的社会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只有那些农村出生人口中的精英才能成功地实现“农转非”(Wu & Treiman, 2004)。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试图沿其他维度来分解城镇居民群体,例如本城市居民与城市间移民或者城市下岗工人与非下岗工人等(Yang, 2003; Appleton et al., 2004),但都发现农民工始终是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 二、未尽议题与研究设计

上述种种经验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中国发展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沿着个体的户籍身份而分割的,或者简而言之,可以称为“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例如, Meng & Zhang, 2001; Fan, 2001; Yang, 2003)。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这即是说,户籍身份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机会结构不平等的一个新维度、新机制。然而,如果我们回头再仔细揣摩一下户籍制度从它建立至今一直所具有的双重划分特性,就会清楚地发现,户籍身份对城市就业人口的分层结果的影响其实尚没有被完整地加以研究和分析。正如前文所介绍的,户口所在地是除户口类别之外的另一个户籍属性。如果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确实存在,那么研究就应该同时检验这两种户籍属性的影响效应,而非仅仅只关注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与(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显然,已有的经验研究并未就户籍制度如何在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实际上,有一些研究已经提及了本地户口相对于外地户口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所具有的额外“价值”。例如,刘智强(Liu, 2005: 137)指出,许多地方政府会要求本地的工作单位优先甚或仅仅雇佣本地居民

(另见袁志刚等 2005)。<sup>①</sup>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本地居民往往可以获得地方政府提供的特殊权益,包括监管良好的工作岗位或地方性的福利政策等,而外来人员则被排除在这些优待之外。鉴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在分权性的体制安排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在推动,将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分层机制来看待显然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更有甚者,本地农村户口的“价值”还可能会超过外地城市户口,尤其是对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来说,因为这些地方同时吸收了来自本地农村和外地城市的大量移民。正如杨云彦(Yang, 2003: 147 - 148)所强调得那样,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中一种分割方式是沿着户口所在地展开的: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城市而该城市并非其户口所在地的人,被划归为暂住居民而非永久居民,因而没有被赋予该城市户籍居民所享受的各种权益。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很少有研究在经验层次上同时考察本地户口与城镇户口对个体一系列就业结果的影响,<sup>②</sup>更不用说是衡量和比较这两种户籍属性的相对作用了。

已有研究在展示户籍身份的分层作用时还存在另一个缺陷,即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也有一些例外,如张展新, 2004; Démurger et al. 2009)。虽然研究者正确地认识到了户籍身份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他们往往强调的是由城镇居民和农村移民这两个人群所代表的“双层劳动力市场”(见 Meng & Zhang, 2001)。他们通常援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将中国社会中的户籍身份类比为西方国家中常见的性别和种族等分割标志(例如, Fan, 2001)。但是,这种理论总结在方法论上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已经在西方文献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批判中表述得很清楚了,即用观察到的两个人群之间的反差来定义劳动力市场分割,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而混淆了因果作用(参见 Hodson & Kaufman, 1982)。而且,如果研究者只停留和满足于户籍群体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结论,实际上会妨碍我们更好地理解户籍制度在限定个体机会结构上的

① 关于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方就业保护政策的制度性原因,可参见蔡昉等(2001)的论文。

② 杨云彦(Yang, 2003)的研究也不例外,因为他将非本地户籍人口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整体,而没有区分城市移民和农村移民。张展新(2004)虽然用城市/农村、迁移/未迁移两个维度对劳动者作了区分,但他只研究了进入垄断产业就业的机会差异,且并未将户籍制度作为分析重心。陆益龙(2008)虽然在模型中放入了户口级别和户口所在地两个变量,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确,也没有发现户口所在地对职业获得和收入水平的作用。

具体过程和机制。换言之,以往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呈现不同的户籍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差异(即使是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体特征),而很少揭示这些差异在逻辑上到底是如何被户籍制度所决定的。

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城市经济结构本身的分割性(如果它确实适用于中国的话),然后再考察个体是否以及如何在其中按照户籍分层这一理论命题所预示的那样表现出就业结果差异。其实,已经有文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城市经济结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分割性的特征。例如,受二元经济理论关于工业社会经济体被分割为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这一观点的启发(参见 Beck et al., 1978),林南和边燕杰(Lin & Bian, 1991)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分割为特征的,支撑这一论点的经验发现是,进入国有部门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声望和工资水平)。这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相当一致,即,国有部门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例如劳动力素质和工作福利(Bian, 1994)。对这一来自中国的经验观察的理论解释是所有再分配经济体制所共有的:一方面,国有部门更接近于中央经济决策部门,拥有更多由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讨价还价能力(Kornai, 1986),因此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分配上被给予了更多的优先权(Szelenyi, 1978; Domanski, 1988);另一方面,再分配体制更倾向于国有单位,可能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即它们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Whyte & Parish, 1984)。

尽管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或市场部门)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正如许多受市场转型理论所推动的经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Nee, 1989, 1996; Bian & Logan, 1996; Zhou, 2000),但对中国城市经济二元结构的这一理念型归纳始终在社会分层的文献传统中被保持和强调(郑路, 1999; Zang, 2002; 边燕杰等, 2006; 吴愈晓、吴晓刚, 2009)。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行业垄断这一新的经济分割形态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金玉国, 2001; 边燕杰、张展新, 2002; 张展新, 2004; 郝大海、李路路, 2006; 吕康银、王文静, 2008; 陈钊等, 2010; 岳希明等, 2010)。有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分割效应正在弱化,而行业垄断已经或将会取代其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分割的主要动力机制(例如聂盛, 2004; 晋利珍, 2008)。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在经验

层次上将这两种经济分割维度作系统性的对比考察,尤其是对本文所关注的户籍分层来说。

已有文献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缺憾,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动机。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旨在回答前述两个问题,即,其一,两种不同的户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个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其二,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是否以及如何与城市经济的分割结构发生互动?本文将运用一个新的研究设计来解决这两个未尽的研究议题。简言之,为完整地检验个体的户籍身份如何决定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我们按照户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划分特性构建一个含有四种类别的户籍身份变量:本地城镇户口、本地农村户口、外地城镇户口、外地农村户口,从而将研究对象划分为4组户籍人群来同时进行比较。在关注户籍身份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按照所有制维度和行业维度来分别测量城市经济结构的分割性,以比较和分析哪种分割形态更能反映和捕捉户籍分层过程。

### 三、数据、变量和测量

我们使用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个子数据集来进行经验分析。<sup>①</sup>该数据集中16-59岁的非农就业者原有26000余人,但在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在经济部门中从事非农工作的16-59岁受雇就业者、并放弃存在缺失值的个案之后,最终分析的样本规模为19098人。我们所说的经济部门,是指除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即所谓的公共部门)之外的以经济职能为主的社会活动部门。进行这种限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经济分割理论强调要将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作区别对待的传统(见Wallace & Kalleberg, 1981),一方面考虑到在中国这些机构的就业和人事改革一直明显滞后于企业改革,因而劳动力很少自由流动。我们将雇主和自雇人士排除在分析之外,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在就业性质上的同质性,因为他们的投资行为会对就业结果(尤

<sup>①</sup>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的,关于这项调查在上海市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简要数据公报,详见以下网页:[http://www.stats.gov.cn/tjgb/rk-pegb/dfkpcgb/t20060320\\_402311562.htm](http://www.stats.gov.cn/tjgb/rk-pegb/dfkpcgb/t20060320_402311562.htm)

其是收入)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不少研究都一再表明,自雇和受雇这两种工作性质在吸引就业者尤其是移民就业者时扮演着十分不同的角色(Arum,1997;Meng,2001;Muller & Arum,2004)。

我们特意使用来自一个代表性城市的大样本数据而非全国性、跨地区的抽样数据来进行经验分析,是为了便于对不同的户籍群体进行理论上关心的一系列比较。具体来说,通过将研究对象明确限定于一个地方劳动力市场,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对劳动者就业结果的影响就可以被有效地排除在外,从而避免这种影响被混淆在户籍身份的作用之中。<sup>①</sup>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在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也存在地区差异(Xie & Hannum,1996;Hauser & Xie,2005);而且,理论上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所谓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其实并不存在,而是不可避免地按地域被分割为众多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Topel,1986;Baumgardner,1988)。因此,如果我们要比较的户籍群体分布在众多不同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上,就很难彻底区分户籍身份的效应与地方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结构性效应。<sup>②</sup>而且,判断某人是否持有本地户口在单个城市数据中操作起来更加简便,考察本地户口的“价值”在特定的城市语境下也更加直观。尽管本文分析的只是来自上海市的数据,但我们认为,其发现和结论能够推论至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天津、杭州、广州等沿海大中城市。

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收集了受访者在个体特征、户籍登记及就业方面的许多信息。根据受访者两方面的户籍信息——即户口所在地与户口类别,我们就能将样本按户籍身份划分为4个群体:本地城镇居民(即持有上海城镇户口)、本地农村居民(即持有上海农村户口)、外地农村移民(即持有非上海的农村户口)与外地城镇移民(即持有非上海的城镇户口)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并将以3个虚拟变量(本地城镇居民为参照组)的形式进入模型。个体特征变量包括3个: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年龄(连续变量,同时引入年龄的平方项)、受教育程度(定类变量,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

① 当然,地区之间除了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之外,还存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不同。但就户籍身份所造成的就业结果差异来说,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

② 陆益龙(2008)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户口所在地对职业获得和收入水平的作用,可能就是因为他使用的是全国性调查数据,所以本地户口的价值无法清晰地体现出来。

大专及以上学历 3 个类别 (第 1 类为参照组) ,它们在模型中是控制变量 ,主要反映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此外 ,还有 1 个控制变量是每周工作时间 ,以受访者在接受调查时所回答的上周工作小时数来测量。

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构成了本研究的一系列因变量。我们首先关心的是部门进入 ,即个体进入哪一个经济部门内就业。正如前文所介绍的 ,有两个维度可以用来测量中国城市的分割性经济结构 :所有制和行业 ,而每一个维度都可将城市的经济结构划分为两个部门 ,分别是“国有部门 vs. 非国有部门”以及“垄断部门 vs. 非垄断部门”。遵循分层研究文献中的惯常做法 ,我们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一类型的工作单位视为国有部门 ,将“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类型 (其中包括外资企业) 的工作单位视为非国有部门 ,这样就生成了一个按所有制标准划分的部门虚拟变量 (国有部门 = 1) 。另一个按行业标准划分的部门虚拟变量 (垄断部门 = 1) 是以两位行业码为基础生成的 :首先计算每一个细分行业中劳动者在私有制工作单位 (指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 ,包括民营、外资等类型的工作单位) 中的就业比重 ,其次将该比重低于某特定值的细分行业大体划为垄断部门 ,然后对该特定值附近的细分行业的垄断性质作进一步核对与调整 ,最后以调整后的结果为准来划定哪些细分行业属于垄断部门。<sup>①</sup> 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在划分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时都涉及到了所有制 ,但前者是按所有制类型对企业或单位进行划分 ,而后者是按所有制比重对行业进行划分 ,两者在概念上仍然是不同的。

用私有部门的就业比重 (或者反过来用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 这一指标来反映各行业的垄断与非垄断性质 ,这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十分常见 (例如 ,金玉国 2001 ;张展新 2004 ;聂盛 2004 ;晋利珍 2008) 。<sup>②</sup> 虽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垄断这一概念是按市场的集中性 (market concentration) 来定义的 ,即一个行业内的商业活动或市场份额被少数几个寡头公司所控制 (见 Tolbert et al. ,1980) ,但在中国行业垄断却更多地反映为政

① 对特定值的选择不得不掺杂主观判断 (许多类似的研究都如此 ,例如 Tolbert et al. ,1980) 。我们按照该比重的取值分布选择了 0.38 作为区分值 ,在进一步核对 0.38 这一区分值附近的细分行业的垄断性质之后 ,按照岳希明等 (2010) 对垄断行业的识别做了相应的调整。这一具体编码过程详见附录。

② 其他一些研究只对垄断行业作主观上、理论上、或分析上的认定 ,并没有依据特定的客观指标 ,例如 :边燕杰、张展新 2002 ;郝大海、李路路 2006。

府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并与公有制企业相竞争,因此主要是一种行政垄断(参见戚聿东 2002;余东华 2006;岳希明等 2010)。如果某行业内私有部门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部门,该行业在理论上仍可能具有垄断性质,但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垄断实际上指的就是国企垄断,用上述方法来测量中国的行业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最后识别出来的垄断行业名单请见附录。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行业垄断的测量更为准确,因为这里的计算是以分类更细的两位行业码为基础的,而不是像以往的大部分研究那样依赖于三位码行业分类。<sup>①</sup>

除了部门进入之外,本文还关注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另外两个就业结果,即职业和收入。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根据中国职业分类标准(GB/T 6565 - 1999)将受访者所从事的职业作了两位编码(CSC00 编码)。我们对此分别做了两种处理。一是按照国内统计部门惯常使用的职业分类体系,先将其划分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6个大类,再将其简化为“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前2个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体力工人及其他”(包括最后2个大类)4个类别作分析。二是将CSC00 编码先转为ISCO88 编码(国际标准职业分类,1988)再转为ISEI(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分析(Ganzeboom et al., 1992)。ISEI已经在中国研究中得到了应用(例如,边燕杰等 2006),本文使用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充分利用两位职业编码的信息。遵循固有的处理策略,我们对收入变量(具体地讲是月收入)取自然对数。

## 四、结果与分析

表1分别给出了全部样本和4个户籍群体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这

---

① 例如,以往的研究通常都会把一位码的制造业识别为非垄断行业,其实,细分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两位码为18)是典型的非垄断行业,而烟草制品业(两位码为16)则是典型的垄断行业。所以,以两位行业码为数据基础更准确。

里只简要归纳一下值得注意的几项基本观察。

1. 移民人口(包括外地农村移民和外地城镇移民 2 个群体)要比本地居民年轻得多。

2.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明显处于劣势,并且与其户口所在地无关,这在受教育程度、职业的 ISEI 值及收入水平等指标上都有所体现;而且,外地城镇移民看起来甚至比本地城镇居民在这些指标上更具优势。例如,超过 75% 的农村居民只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但却有超过 30% 的城镇居民完成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等教育,而这一数字在外地城镇移民中更接近 50%。

3. 4 个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具有明显差异。用所有制标准来看,本地城镇居民基本上是平均地分布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而其他 3 组人群尽管在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各异,但却都高度集中在非国有部门(比例都超过 85%)。用行业标准来看,本地城镇居民在垄断部门的就业比例最高(超过 20%),而其他 3 组人群却都高度集中在非垄断部门(比例都在 90% 及以上),虽然他们在垄断部门的就业比例各异。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上海 2005)

	全 部 样 本	本地城镇 居 民	本地农村 居 民	外地农村 移 民	外地城镇 移 民
<b>连续变量</b>					
性别(男性 = 1)	.59 (.49)	.61 (.49)	.51 (.50)	.58 (.49)	.57 (.50)
年龄	34.70 (10.71)	38.39 (10.52)	38.28 (9.63)	28.66 (8.32)	29.85 (8.77)
职业( ISEI)	40.92 (11.35)	44.42 (11.84)	36.83 (9.02)	35.44 (7.97)	45.83 (11.69)
月收入(元)	1582.06 (1547.75)	1915.80 (1853.20)	1029.87 (557.31)	1069.15 (557.51)	2238.02 (2068.88)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44.35 (9.74)	41.01 (6.15)	45.27 (9.70)	49.80 (12.15)	42.99 (7.75)
<b>定类变量</b>					
受教育程度					

续表 1

	全 部 样 本	本地城镇 居 民	本地农村 居 民	外地农村 移 民	外地城镇 移 民
初中及以下	48. 28	27. 47	75. 47	79. 40	21. 13
高中/中专	30. 42	40. 03	22. 01	17. 83	29. 74
大专及以上	21. 30	32. 50	2. 52	2. 77	49. 13
职业(类别)					
体力工人及其他	46. 87	30. 94	69. 20	70. 99	22. 72
商业、服务业人员	24. 49	26. 66	16. 44	21. 34	34. 26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2. 67	18. 98	7. 31	3. 98	13. 76
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15. 97	23. 42	7. 06	3. 69	29. 26
部门(所有制)					
非国有	73. 02	53. 03	93. 09	95. 05	87. 98
国有	26. 98	46. 97	6. 91	4. 95	12. 02
部门(行业)					
非垄断	85. 87	77. 54	89. 54	96. 81	91. 45
垄断	14. 13	22. 46	10. 46	3. 19	8. 55
N	19098	9677	2026	5956	1439

注: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均值和标准差,定类变量报告的是百分比。

这些描述性统计结果所传达的信息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模式十分复杂,取决于考虑的是哪一种户籍属性(户口所在地或是户口类别)以及观察的是哪一种就业结果。但是,目前我们尚无法确定户籍身份的净效应,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双变量分析,没有控制其他变量例如人力资本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将通过估计多变量模型来考察不同的户籍群体在一系列就业结果上是否以及如何显示出相似性或差异性,这分别包括对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差异的分析。

表 2 给出了部门进入的二项 Logit 模型。模型 A 的因变量为是否在国有部门就业,模型 B 的因变量为是否在垄断部门就业。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户籍身份变量的作用。可见,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这些个体特征之后,与本地城镇居民相比,其他 3 组人群无论是进入国有部门还是垄断部门的概率都明显更低。这表明,即使具备了相同的人力资本条件,农村居民和外来移民进入本地核心经济部门就业的

机会仍然受到限制。有趣的是:(1)当以所有制标准来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分割性时(见模型 A),户籍身份变量主要体现的是户口类别的差异(即通常所说的城乡差异),因为“本地农村”与“外地农村”2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在数值上更接近(-2.230与-2.135)<sup>①</sup>,而外地城镇移民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系数为-1.576)。(2)但是,当以行业标准来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分割性时(见模型 B),户籍身份变量则主要体现的是户口所在地的差异(即本地户口相对于外地户口的“价值”),因为本地农村居民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异最小(系数为-.622),而外地农村移民和外地城镇移民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系数分别为-1.641和-1.006)<sup>②</sup>。

表 2 部门进入的二项 logit 模型 (上海 2005)

	模型 A (国有部门 = 1)	模型 B (垄断部门 = 1)
户籍		
本地城镇(参照组)		
本地农村	-2.230 *** (.093)	-.622 *** (.082)
外地农村	-2.135 *** (.070)	-1.641 *** (.087)
外地城镇	-1.576 *** (.086)	-1.006 *** (.100)
性别(男性 = 1)	.367 *** (.040)	.332 *** (.046)
年龄	.114 *** (.014)	.150 *** (.017)
年龄平方	-.001 *** (.000)	-.002 *** (.000)

① 经过统计检验 这 2 个系数数值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显著。

② 经过统计检验 这 3 个系数数值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续表 2

	模型 A (国有部门 = 1)	模型 B (垄断部门 = 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参照组)		
高中/中专	. 626 *** (. 048)	. 347 *** (. 056)
大专及以上	. 669 *** (. 055)	. 723 *** (. 064)
常数项	-3. 776 *** (. 269)	-4. 939 *** (. 320)
N	19098	19098
LR X <sup>2</sup>	5266. 91 ***	1653. 71 ***
Pseudo R <sup>2</sup>	. 24	. 11

注: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 p < 0. 05 , \*\* p < 0. 01 , \*\*\* p < 0. 001 (双尾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研究发现与张展新(2004)所提出并论证的“进入垄断产业就业的‘梯度’假设”并不完全一致,他假设未迁移城市劳动者、迁移城市劳动者、未迁移农村劳动者和迁移农村劳动者进入垄断行业的可能性依次降低。但本研究在改进了对行业垄断的测量方法后发现,<sup>①</sup>这一“梯度”实际上依次是未迁移城市劳动者、未迁移农村劳动者、迁移城市劳动者与迁移农村劳动者。这一结果才真正符合该假设背后的因果机制和理论预期,即迁移劳动者作为“外来人”进入垄断行业就业的机会要比未迁移劳动者小(张展新, 2004:49)。我们认为,由于垄断行业必然也存在一些低端就业岗位,

① 与张展新(2004)的研究相比,本文在测量方法上的改进主要有3点:(1)以更细的两位行业码而非粗略的一位行业码为数据基础;(2)使用广义的“从业人员”而非狭义的“职工”概念来计算劳动者在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或者在私有部门的就业比重);(3)这里对垄断行业的识别已经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但张展新用全国性的年鉴数据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基于这些测量上的改进,我们认为本文的经验发现更稳健。

当本地城镇居民对这些岗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时,本地农村居民就能优先分享这一“剩余”。虽然这种优先可能是来自社会性的,例如本地农村居民相对于外来移民在就业信息获得或人际关系网络上本来就具有优势,但更显见的却是来自制度性的,例如本地就业问题的压力或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需要使得地方政府促使有关部门和单位优先吸纳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上海为例,相关部门从2000年起要求单位新招用外来劳动力者,需要先进入上海职业介绍网络招用本地劳动力,在招不到的情况下才可招用外来劳动力,另外还要求各单位按实际使用外地劳动力的人数缴纳务工管理费和管理基金,以提高企业使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袁志刚等 2005:207)。

我们现在转入讨论户籍身份对职业获得的影响。由于已有研究大多都关注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职业隔离,这里也以职业类别为因变量,使用多项 Logit 模型来进行分析。表 3 的结果显示,不管是模型 A 还是模型 B,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自变量后,社会群体在户籍身份上的不同相应地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位置的差异。与本地城镇居民相比,本地农村居民和外地农村移民成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成为“体力工人及其他”的概率无一例外地都在统计上显著更低(2 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几乎在每一个方程中都显著为负),但是,外地城镇移民成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成为“体力工人及其他”的概率却在统计上显著更高(该虚拟变量的系数在第一和第三个方程中都显著为正),他们成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相对于成为“体力工人及其他”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该虚拟变量的系数在第二个方程中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因此,相对于本地城镇居民而言,来自农村的就业者更多地是被挤迫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即使是本地农村居民也不例外),而外地城镇移民则更多地流入“商业、服务业人员”及“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个就业领域。显然,如果“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可以接受的话,那它也是一个“三层”劳动力市场,而非通常所强调的“双层”劳动力市场。

以上观察到的这种户籍群体之间的职业差异,其背后有着特定的社会过程。中国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大军本来是以本地城镇居民为绝对主力的,但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国企改革(下岗失业潮)已经将其中

表 3 职业获得的多项 logit 模型 (上海 2005)

	模型 A(国有部门=1)			模型 B(垄断部门=1)		
	商 业、 服务业人员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单位负责人和 专业技术人员	商 业、 服务业人员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单位负责人和 专业技术人员
户籍						
本地城镇 (参照组)						
本地农村	-1.080 *** (.072)	-.986 *** (.100)	-.342 ** (.111)	-1.000 *** (.070)	-.927 *** (.097)	-.180 (.110)
外地农村	-.749 *** (.056)	-1.425 *** (.089)	-.768 *** (.095)	-.690 *** (.054)	-1.356 *** (.088)	-.590 *** (.093)
外地城镇	.385 *** (.082)	-.191 (.105)	.206* (.096)	.445 *** (.081)	-.128 (.104)	.364 *** (.096)
性别(男性=1)	-.457 *** (.039)	-.249 *** (.054)	-.514 *** (.054)	-.465 *** (.039)	-.269 *** (.054)	-.536 *** (.055)
年龄	-.066 *** (.013)	-.142 *** (.017)	-.044* (.019)	-.065 *** (.013)	-.145 *** (.017)	-.058 ** (.019)
年龄平方	.001 *** (.000)	.002 *** (.000)	.001 *** (.000)	.001 *** (.000)	.002 *** (.000)	.001 *** (.00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参照组)						
高中/中专	.584 *** (.046)	.967 *** (.065)	3.630 *** (.129)	.561 *** (.045)	.954 *** (.065)	3.580 *** (.129)
大专及以上学历	1.542 *** (.076)	2.916 *** (.087)	6.123 *** (.142)	1.524 *** (.076)	2.902 *** (.087)	6.061 *** (.142)
部门	-.272 *** (.051)	-.086 (.060)	-.271 *** (.062)	-.200 ** (.064)	.285 *** (.069)	.620 *** (.069)
常数项	.646 ** (.224)	.403 (.319)	-3.799 *** (.366)	.591 ** (.223)	.391 (.319)	-3.705 *** (.367)
N	19098			19098		
LR $\chi^2$	9007.85 ***			9122.40 ***		
Pseudo R <sup>2</sup>	.19			.19		

注:两个模型中因变量的参照组都是“体力工人及其他”。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 < .05, \*\* p < .01, \*\*\* p < .001(双尾检验)。

的许多人转移了出来,而这期间同样来势迅疾的还有“民工潮”,因此,大量原本从事蓝领工作的本地城镇居民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性的职业,而商业性、服务性工作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这样一来,农村移民进入这种工作领域的空间就更被压缩了,因为他们本来就相对缺乏这类职业对语言能力、沟通技巧和城市生活经验等方面的“软性”素质要求。就外来城镇移民而言,他们主要是按教育水平区分的两类人:一类人虽然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获得本地城市户口<sup>①</sup>,因此,他们主要流向白领职业。另一类人是未能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地城镇居民,他们流向大中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就业机会更多,即使他们只能从事商业性、服务性工作。我们的数据也倾向于支持这种分析:在成为“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外来城镇移民中,超过八成的人都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在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的外来城镇移民中,约六成的人只有高中及以下的教育程度。

表3中的控制变量“部门”在模型A和模型B中的表现也值得比较。相似之处是,商业性、服务性职业在国有部门比在非国有部门、在垄断部门比在非垄断部门更少(该变量的系数在第一个方程中显著为负),表明这种就业岗位目前主要是由私有的竞争性经济部门所提供。不同之处是,国有部门提供的所谓的“好工作”、“体面的工作”或“白领工作”岗位反而比非国有部门要少(该变量的系数在第二和第三个方程中为负,且后者统计显著),而垄断部门提供的这类工作却比非垄断部门要多(该变量的系数在第二和第三个方程中为正,且统计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其内部的职业结构已经趋于按需配置,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能够显著地提升职业地位,但是,行业的垄断性质却有迹象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人们职业地位的一个新的决定因素。将ISEI作为因变量的补充性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使用与本模型相同的变量,国有部门就业人员比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的ISEI平均得分低0.43( $p < .05$ ),而垄断部门就业人员比非垄断部门就业人员的ISEI平均得分则高出2.22( $p < .001$ )。<sup>②</sup>

① 类似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对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总量的控制十分严苛,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政策。例如,高校应届毕业生入籍的评分政策就使得每年都有许多高学历人才未能获得上海户籍。

②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这一分析的完整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对户籍群体收入差异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1是基准模型,包括了表示户籍身份的3个虚拟变量及其他一些基本自变量。模型2加入了部门这一控制变量,模型3进一步加入了3个虚拟变量与部门变量之间的交互项。由于3个模型都控制了个体的人力资本和职业细类,因此模型所反映出的户籍群体之间在收入上的显著差异可以近似看作是“同工不同酬”这样一种社会歧视的经验证据,因为这种收入上的显著差异不能被我们观察到的个体特征所解释。<sup>①</sup>在基准模型中,本地农村居民和外地农村移民的收入与本地城镇居民相比都显著较低(即存在收入歧视),但外地城镇移民与本地城镇居民的收入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不存在收入歧视)。当加入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部门变量以及3个交互项后(见模型A2和模型A3),发现第一个交互项的系数统计显著,且符号与第一个虚拟变量的系数相反,表示本地农村居民所受到的收入歧视在国有部门中大幅减小(但其他2个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然而,当加入以行业为划分标准的部门变量以及3个交互项后(见模型B2和模型B3),一方面仍然发现本地农村居民所受到的收入歧视在垄断部门中有所减小,另一方面却发现外地农村移民所受到的收入歧视在垄断部门中大幅增强了(第二个交互项的系数统计显著,且方向与第二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同为负),而外地城镇移民在非垄断部门中本来还享有某些收入优势,但在垄断部门中却受到了收入歧视(第三个交互项的系数统计显著,且方向与第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相反)。

以往的研究都强调在城市中就业的农民工普遍受到了收入歧视(见Meng & Zhang 2001;蔡昉 2005;姚先国等 2008;田丰 2010)。如果这种歧视论确实具有实质性意义,那么上述结果就进一步揭示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在这种歧视上似乎不存在明显差别,而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相比却倾向于加剧这种歧视。为明确验证这一结论,同时也为具体量化这种收入歧视的程度,我们用Blinder-Oaxaca分解来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Blinder-Oaxaca分解最初是被用来研究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Blinder, 1973; Oaxaca, 1973),但发展到后来已经被广泛用于任意两个群体之间在各种连续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还有一些未被观测到的个体差异存在于模型的误差项中,这里所说的社会歧视可能同时包含了真正的歧视部分和不可测量部分。

表 4 收入差异的多元回归模型 (上海 2005)

	模型 1	模型 A (国有部门 = 1)		模型 B (垄断部门 = 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B2	模型 B3
户籍					
本地城镇(参照组)					
本地农村	-.188 *** (.012)	-.176 *** (.012)	-.192 *** (.013)	-.182 *** (.012)	-.187 *** (.012)
外地农村	-.135 *** (.010)	-.125 *** (.010)	-.128 *** (.011)	-.126 *** (.010)	-.117 *** (.010)
外地城镇	.010 (.013)	.020 (.013)	.016 (.014)	.020 (.013)	.033* (.014)
性别(男性 = 1)	.207 *** (.007)	.205 *** (.007)	.204 *** (.007)	.204 *** (.007)	.203 *** (.007)
年龄	.035 *** (.002)	.035 *** (.002)	.034 *** (.002)	.034 *** (.002)	.034 *** (.002)
年龄平方	-.001 *** (.000)	-.001 *** (.000)	-.001 *** (.000)	-.000 *** (.000)	-.001 *** (.00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参照组)					
高中/中专	.167 *** (.008)	.164 *** (.009)	.165 *** (.009)	.166 *** (.008)	.166 *** (.008)
大专及以上学历	.680 *** (.011)	.676 *** (.011)	.677 *** (.011)	.677 *** (.011)	.677 *** (.011)
职业(ISEI)	.009 *** (.000)				
每周工作小时	.001 *** (.000)				
部门	-	.036 *** (.008)	.026 ** (.009)	.075 *** (.010)	.087 *** (.011)
交互项					
本地农村*部门	-	-	.189 ***	-	.070*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A (国有部门 = 1)		模型 B (垄断部门 = 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B2	模型 B3
			(. 040)		(. 034)
外地农村* 部门	-	-	. 000	-	-. 147 ***
			(. 028)		(. 034)
外地城镇* 部门	-	-	. 017	-	-. 126 **
			(. 037)		(. 043)
常数项	5. 924 ***	5. 914 ***	5. 918 ***	5. 936 ***	5. 926 ***
	(. 044)	(. 044)	(. 044)	(. 044)	(. 044)
N	19098	19098	19098	19098	19098
F	1476. 18 ***	1344. 88 ***	1059. 41 ***	1351. 83 ***	1066. 12 ***
Adj. R <sup>2</sup>	. 44	. 44	. 44	. 44	. 44

注：模型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值。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双尾检验)。

变量上的差异。以工资的性别差异为例，简单地讲，这种方法是把工资的性别差异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可以由性别不同特征来解释（即特征效应，或可解释部分），另一部分则不能由性别的特征所解释（即系数效应，或不可解释部分），而后者一般就被认为是歧视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如果用  $\bar{W}_m$  表示男性的平均工资水平，用  $\bar{W}_f$  表示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再分别用  $\bar{X}_m$  和  $\bar{X}_f$  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一系列个人特征的均值，则两性的工资决定方程分别为： $\bar{W}_m = \bar{X}_m \hat{\beta}_m$ ， $\bar{W}_f = \bar{X}_f \hat{\beta}_f$ 。于是，Blinder-Oaxaca 分解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bar{W}_m - \bar{W}_f = (\bar{X}_m - \bar{X}_f) \hat{\beta}_f + (\hat{\beta}_m - \hat{\beta}_f) \bar{X}_m \text{ ①}$$

其中，等式右边的第一部分为可解释部分，第二部分为不可解释部分。我们对该分解方法的应用设定如下：(1) 比较的两个群体分别是本地

① 这里为了表述的简便，只是展示了 Blinder-Oaxaca 分解的基本思想。其实，由于有可能存在某种非歧视的系数效应，分解公式的表达实际上更为复杂，并涉及到指数的选择这一问题。读者可参考詹恩 (Jann 2008) 的总结性介绍，我们对参照指数的处理正是按照詹恩的建议进行的。

城镇居民和农村户籍劳动力(包括本地农村居民和外地农村移民,他们都属于通常所说的农民工);(2)收入变量使用的是月收入的对数值,且两个群体各自的收入方程中的自变量也与表4中模型的主要自变量相同,即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两位码职业的ISEI分值、每周工作时间;(3)先对全部样本作分解,之后再将其划分为国有部门就业者和非国有部门就业者分别作分解,再将样本划分为垄断部门就业者和非垄断部门就业者分别作分解。结果见表5。

表5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收入对数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

(上海 2005)

	全部样本	按所有制划分		按行业划分	
		非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	非垄断部门	垄断部门
差值	.454 (100%)	.446 (100%)	.345 (100%)	.423 (100%)	.451 (100%)
可解释的部分	.293 (64.5%)	.311 (69.8%)	.224 (64.9%)	.288 (68.1%)	.223 (49.4%)
不可解释的部分	.161 (35.5%)	.135 (3.2%)	.121 (35.1%)	.135 (31.9%)	.228 (50.6%)

注:括号外的数字是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百分比。

就全部样本来说,本地城镇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是农村户籍人口月平均收入的1.6倍( $e^{0.454} = 1.6$ ),即使是分经济部门来看,这一数字也都在1.4-1.6之间,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总体上来说,这种收入差异更多地是可以用人特征来解释的,社会歧视因素约占35.5%。即使是将城市经济结构分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来看,结果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当把城市经济结构分为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来比较时,却显示出了很大的反差:非垄断部门对农民工的收入歧视只有31.9%,而垄断部门却高达50.6%。由此可见,分割性的经济结构对户籍收入分层的调节作用并不是沿所有制维度,而是沿行业垄断维度展开的,目前对农民工的收入歧视并不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有所不同,但却在垄断行业中表现得更为严重。至于垄断行业中的农民工(尤其是外地农村移民)为何会受到更为严重的

收入歧视,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临时的、替补的、外围的劳动力被招募,而不享有正式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与外来城镇移民被发现在垄断行业反而遭受收入歧视的逻辑应该是一致的。<sup>①</sup>

## 五、总结与讨论

户籍身份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城市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结果?根据本文对上海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可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考虑的是哪一种户籍属性(户口所在地或是户口类别)以及观察的是哪一种就业结果。以往对中国城市社会中户籍分层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展开这一复杂的社会事实,因为它们大多只关注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而忽视了城镇内部的人口流动,并且甚少考虑城市经济结构自身的分割性。从已有文献的这些遗憾出发,本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通过同时比较按户籍身份划分的4个社会群体——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外地城镇移民和外地农村移民,从而展示了更多有价值的经验发现。

已往的经验研究一致表明,城乡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构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础性的不平等结构,这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再次证实。我们发现:(1)反映在部门进入上,农村户籍劳动者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机会显著地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2)反映在职业获得上,农村户籍劳动者更多地是被挤迫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而城镇户籍劳动者则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较好的工作,确实存在所谓的职业隔离或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3)反映在收入差异上,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的差异,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仍然显著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这种“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民工所受到的社会歧视。

---

① 虽然我们将外地移民(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镇)在垄断部门所遭受的这种收入歧视解释为劳动力招募过程中的“内部人—外部人”区分策略,但囿于资料限制,尚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事实上,其他研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例如,武中哲(2007:55)基于一些访谈资料指出,城市分割劳动力市场中有许多临时工,“他们的收入比正式工作人员的待遇低很多,工资发放没有一定标准,由供求双方协商决定,人员流动性很高,几乎没有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待遇。”深入探讨垄断部门的外部人歧视问题,无疑需要更多的定性研究资料。

然而,运用一个新的研究设计,即按照户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划分特性构建一个含有四种类别的户籍身份变量,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从而对已有文献作出了重要的补充:

1. 通过将城市中的外来移民分解为农村移民和城镇移民,我们发现,这两个亚群体在人口特征和经济社会地位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与农村移民被挤压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不同,城镇移民相对于本地城镇居民却能更多地流入“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个就业领域。可见,城市“外来劳动力”或“流动人口”其实包含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亚群体,在概念上含混地将其视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是不适当的,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加以避免。

2. 通过将农村户籍劳动力或农民工区分为本地居民和外地移民,我们发现,虽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都受到了收入歧视,但对这两个亚群体来说,分割性的经济结构中的垄断部门对这种收入歧视的调节作用却是相反的:它抑制了“本地农民工”所受到的收入歧视,却强化了“外地农民工”所受到的收入歧视。可见,即使是“农民工”这一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特定的社会过程中也受到了区别性对待。

3. 通过比较4个户籍群体之间的相对差别大小,我们发现,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过程除了耳熟能详的由户籍类别这一属性所造成的“城乡差别”之外,还存在由户籍所在地这一属性所形成的“内外差别”。这种“内外差别”所体现出的本地户口“价值”主要体现于进入垄断部门的就业机会及其所连带的收入决定过程。

上述结论已经反映出,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与城市经济的分割结构之间具有紧密的互动。而且,通过同时引入所有制和行业两种分割维度来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部门进入上两者分别凸显了“城乡差别”和“内外差别”,但行业垄断这种分割形态更能反映和捕捉户籍分层的作用逻辑与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户籍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上:(1)对外来移民(包括外地农村移民与外地城镇移民)的收入歧视在垄断行业比在非垄断行业中表现得更严重,但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中却没有什麼差别;(2)就农民工(包括本地农村居民与外地农村移民)所受到的收入歧视程度而言,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却相差不大。国有部门

与市场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分割在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文献中总是被加以强调。这一总括性的两分法理念型的确方便了以往的经验研究,但在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剧变后,现在是重新考虑其理论效力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因为垄断性分割比所有制分割更能反映户籍制度决定个体分层地位的生动过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国有部门对职业地位的总体性提升作用已经不再,相反,行业的垄断性质却有迹象替代其曾经扮演的结构性角色。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相继强调行业垄断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目前的局限是学术界对我国行业垄断的测量尚未达成共识,这需要将来的研究认真加以解决。

在以往文献中,户籍分层研究与经济结构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隔绝的。通过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本文就户籍身份是否以及如何决定了个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或社会分层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图景。这应该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后果的理解。尽管社会学家通常倾向于将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归纳为一种制度性的结果,但他们时常也会面临这样一种追问:这种不平等到底反映的是户籍身份差别,抑或只是城乡地区差别?试想一下,如果只是比较农村移民和城镇居民——这正是以往的经验研究不断重复的典型方法,那么,前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控制了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之后)是单纯由他们的农村户籍身份所致,还是由城乡地区之间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例如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教育质量等方面)所致,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但本研究可以明确支持户籍制度造成了个体之间身份上的不平等这一理论总结:既然本地农村居民比外来城镇移民在地方劳动力市场就业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反而受到优待,那么就排除了城镇居民由于地区发展因素会自然而然地享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这种观点。因此,户籍身份背后的制度性安排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就需要制度上的改变来消除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正需要朝着这一最终目标迈进。

附录 样本中的垄断行业识别 (垄断 = 1; 上海 2005)

行业大类 (1 位码)	行业 细类 (2 位码)	名 称	指标 a	初 始 划分 b	参 考 划分 c	最 终 划分 d
制造业	16	烟草制品业	.00	1	1	1
	25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13	1	1	1
	32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24	1	-	1
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4 - 46	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12 - .15	1	1	1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51	铁路运输业	.07	1	1	1
	53	城市公共交通业	.10	1	-	1
	54	水上运输业	.20	1	1	1
	55	航空运输业	.16	1	1	1
	56	管道运输业	.25	1	-	1
	59	邮政业	.41	0	1	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	60	电信和其他信息 传输服务业	.35	1	1	1
住宿和餐饮业	66	住宿业	.36	1	0	0
金融业	68	银行业	.09	1	1	1
	69	证券业	.18	1	1	1
	70	保险业	.41	0	1	1
	71	其他金融活动	.51	0	1	1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75, 77, 78	研究与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交流和 推广服务业	.00 - .25	1	-	1
	76	地质勘查业	.38	1	-	-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79 - 81	水利管理业， 环境管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12 - .24	1	-	1

续附录

行业大类 (1 位码)	行业 细类 (2 位码)	名 称	指标 a	初 始 划分 b	参 考 划分 c	最 终 划分 d
教育	84	教育	.10	1	-	1
卫生、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业	85-86	卫生, 社会保障业	.00-.05	1	-	1
	87	社会福利业	.34	1	-	-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88-91	新闻出版业、 广播电视电影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16-.27	1	-	1
公共管理和 社会组织	96	群众团体、 社会团体和 宗教组织	.10	1	-	1
	97	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	.11	1	-	1

注:a. 指标计算的是每一个细分行业中劳动者在私有制工作单位中的就业比重,计算时所使用的样本比正文经验分析中所使用的最终样本要大。

- b. 初始划分的标准是按指标的取值分布将小于或等于.38 的行业细类编码为 1。
- c. 此外参考的是岳希明等(2010) 的最近研究,由于岳文只选取了典型的垄断和竞争行业来研究,所以该栏中有一些地方为“-”。
- d. 做最终划分时主要核查指标值位于.38 附近的情况,调整标准是:初始划分与参考划分不一致的,以参考划分为准;没有参考划分时,就将其排除在分析之外,所以该栏中有一些地方为“-”。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 2006,《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边燕杰、张展新 2002,《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蔡昉 2005,《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北京:商务印书馆。
- 蔡昉、都阳、王美艳 2001,《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第 12 期。
- 陈钊、万广华、陆铭 2010,《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 国际劳工组织,1988,《国际标准职业分类》(<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isco88/index.htm>)。
- 郝大海、李路路 2006,《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 2003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金玉国 2001,《我国行业工资水平与垄断程度关系的定量测度》,《江苏统计》第3期。
- 普利珍 200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变迁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第8期。
- 陆益龙 2003,《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8,《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吕康银、王文静 2008,《我国行业间工资差异的测度与分解》,《求索》第7期。
- 莫荣、刘军、陈兰 2005,《就业形势: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汝信等主编《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聂盛 2004,《我国经济转型期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到行业分割》,《当代经济科学》第6期。
- 戚聿东 2002,《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分拆式改革的误区分析及其出路》,《管理世界》第2期。
- 田丰 2010,《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吴愈晓、吴晓刚 2009,《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武中哲 2007,《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科学》第4期。
- 姚先国、李莉、张海峰 2008,《农民工工资歧视与职业隔离——来自浙江省的证据》,《管理学家(学术版)》第3期。
- 余东华 2006,《中国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研究》,《经济研究参考》第16期。
- 袁志刚、封进、张红 2005,《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上海的例证及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岳希明、李实、史泰丽 2010,《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张展新 2004,《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郑路 1999,《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6期。
-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 Qingjie Xia 2004, "Contrasting Paradigms: Segment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abour Market."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
- Arum, Richard 1997, "Trends in Male and Female Self-employment: Growth in A New Middle Class or Increasing Marginal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5.
- Baumgardner, James R. 1988, "The Division of Labor, Local Markets, and Worker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 Beck, E. M., Patrick M. Horan & Charles M. Toolbert II 1978, "Stratification in a Dual Economy: A Sectoral Model of Earnings Deter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ian, Yanjie & John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Blinder, Alan S. 1973,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8.
- Chan, Kam Wing 1994,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Kam Wing ,Ta Liu & Yunyan Yang 1999, "Hukou and Non-hukou Migrations in China: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5.
- Chan ,Kam Wing & Li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China Quarterly* 160.
- Cheng ,Tiejun &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 Démurger ,Sylvie ,Marc Gurgand ,Shi Li & Ximing Yue 2009, "Migrants as Second-class Workers in Urban Chin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 Domanski ,Henryk 1988,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in Pola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9.
- Fan ,C. Cindy 2001, "Migration and Labor-market Returns in Urban China: Results from a Recent Survey in Guangzhou."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 2002,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
-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 Donal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 Hauser ,Seth & Yu Xie 2005,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4.
- Hodson ,R. D. & R. L. Kaufman 1982, "Economic Dualism: A Critical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 Jann ,Ben 2008, "The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fo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Stata Journal* 8.
- Knight ,John ,Lina Song & Huaibin Jia 1999,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
- Kornai ,Já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 Liang ,Zai & Zhongdong Ma 2004,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0.
- Lin ,Nan & Yanjie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 Liu ,Zhiqiang 2005, "Institution and Inequality: The Hukou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
- Meng ,Xin 2001,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A Chinese Case Study." *Asian Economic Journal* 15.
- Meng ,Xin & Junshen Zhang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 Muller ,Walter & Richard Arum 2004,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 R. Arum & W. Muller (eds. ) ,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e ,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Oaxaca , Ronald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4.
- Solinger , Dorothy 1999,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 ,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zelenyi ,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 Tolbert , Charles , Patrick M. Horan & E. M. Beck 1980,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egmentation: A Dual Economy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 Topel , Robert H. 1986, "Local Labor Marke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 Wallace , Michael & Arne L. Kalleberg 1981,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Firms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Toward a Specification of Dual Economy Theory." In Ivar Berg ( ed. ) ,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Labor Marke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ng , Feng , Xuejin Zuo & Danching Ruan 2002,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 Whyte , Martin K. &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u , Xiaogang 2007,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
- Wu , Xiaogang & Donal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 1955-1996." *Demography* 41.
- Xie , Yu & Emily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 Yang , Quanhe & Fei Guo 1996, "Occupational Attainments of Rural to Urban Temporary Economic Migrants in China , 1985-1990."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
- Yang , Yunyan 2003, "Urban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Some Observations Based on Wuhan Census Data." *The China Review* 3.
- Zang , Xiaowei 2002,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
- Zhou ,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李骏)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顾燕峰)  
责任编辑:张宛丽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hukou*-base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has two limitations: one is exclusively focusing on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the other is under-considering the segmentation 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y. This paper conducts a more systematic analysis on whether and how *hukou* system plays the role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s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segmented urban economy by simultaneously examining two *hukou* attributions—the type of registration (*hukou leibie*) and the place of registration (*hukou suozaidi*). Based on the data of 2005 1% population survey in Shanghai,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ach *hukou* attribution has its own effect. Although urban-rural divide constitutes the basic pattern of sector entr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local and nonlocal labors are also treated differently in the stratification process. It is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 vs. non-state” ownership segmentation, “monopoly vs. non-monopoly” industrial segmentation is more capable to capture such kind of complicated *hukou*-based stratification.

Does Social Mobility Contribute to Reduce the Inequality of Health?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theoretical points of view for explaining health inequalities, i. e., social causation explanation and health selective theory.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at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have determinative effects on health inequalities; however, the latter considers that whether people are healthful would be a screen mechanism for them to move up or down. In past researches, many use longitudinal data to test these two points, while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s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5) to analyze the inequality of health status and expla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bility for lack of ideal data. This research agrees that the health inequality i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was thought to be an important way to reduce the social inequality. So we develop two basic hypothes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health inequalities. The first one is whether people happened to have social mobility would change their health level, and upward mobility would promote their health status, instead for the opposite. The second one is that social mobility can reduce the health gradient of different stratum.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directions and steps of social mobil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oples' level of health, but only long steps of social mobility can promote or restrain works.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China, the social causation theory has more power than health selective theory for explaining the health inequality. Social mobility has mixed effec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and reduces it.